

论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物与人的奇迹

——以金宝英小说《物种源始》为例

苏超慧¹ 邵薇*

(1.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韩国科幻作家金宝英在《物种源始》中对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对环境的作用以及人类与机器人的沟通进行了冷静而诗意的书写, 阐释了物的能动力量以及物人平等共存的“奇迹”。从新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出发, 能够深入挖掘作品中所强调的“纯粹物质性”, 以及物质本身, 尤其是无机质的“动能”和物人之间“内在互动”的关系。这不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金宝英在作品中对物质“生命活力”的肯定及强调和她对物人关系的诗性重塑, 也能为认可物质活力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物质主义; 《物种源始》; 金宝英; 物与人; 奇迹

基金项目: 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支持下的 K 学术拓展研究所项目 (AKS-2023-KDA-1250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生态诗歌对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与转化研究” (22CWW0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6.1107

引言

迈入 21 世纪以来, 人工智能、生物能源等前沿技术对后人类时代的物人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流行病毒等危机, 正以日益严峻的姿态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及人与万物的关系。面对这些挑战,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物质的关系, 以新的眼光看待那些曾经被定义为“无生命”的物质, 由此激发出对传统唯物主义主客二元论的解构力量。因此, 新物质主义的兴起可以视为对传统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它不仅承认了物与人之间辩证发展的相互作用, 还从本体论的维度彻底打破了物人的二元秩序, 构建出一种“一元但多层次的本体论” (Coole & Frost, 2010:10)。在这一框架下, 物本身的“动能”(韩启群, 2023:117)与物人之间的“内在互动”(韩启群, 2023:117)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 由此生发的“物转向”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而这种对物质的认同意识也充分体现在一批后人类主义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科幻小说中。

近年来, 韩国当代科幻文学作品, 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创作, 在东亚读者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并在东亚科幻文坛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著名科幻作家金宝英,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而闻名。她的作品常常探讨人与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金宝英的代表作《物种起源小说集》中, 名为《物种源始》的系列故事将焦点投射于金属无机质, 通过虚构的机器人世界故事, 揭示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寄托了人与物共生的奇迹愿望。

在新物质主义的理论视域下, 无机质同样能够被视为文学作品叙事的主体, 甚至拥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在这种阐释框架下, 所有物质都在进行永恒的对话, 其区别仅在于振动频率的差异——这正是对量子物理所揭示规律的一种解读。由此可见, 探索无机质叙事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向物质宇宙归还话语权进一步的尝试。本文就拟从新物质主义维度出发, 以《物种源始》作为研究对象, 剖析作品中展示的人类与机器人、机器人与环境

作者简介: 苏超慧(2003—),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邵薇(1987—),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韩国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 邵薇

之间的密切互动，考察其中涉及的无机质物质动能与物人关系互动书写，以期为当代科幻作品中的新物质主义元素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物的“生命”奇迹

在《物种源始》这部作品中，金宝英不仅述写了人类与机器人的共同命运，更叙述了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有机质和无机质，以及它们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金宝英重新审视人类对于生命的定义，并且尝试展现金属等无机质的“生命力”，体现出新物质主义从本体论层面上对于无机质与生命定义的颠覆。

金宝英的《物种源始》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万年后的地球，这是一个人类与所有生物都几近灭绝的时代。气候灾难后，地球被二氧化碳污染覆盖、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然而，这样的地球却成了机器人的天堂，它们发展了文明社会，从机器人的角度重新审视有机物、重新审视生物、重新审视人类。在金宝英（2024:269）的《物种源始》中，机器人对生物作了如下定义：

必须拥有自己的意志。即，行动原理的命令体系基于自己内部，而非外部。（2）若无法依靠财力或权力自由行动，则无法视为有生命。（3）以电能为主进行能量代谢。（4）拥有晶片。晶片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媒介。（5）一般情况下，诞生于工厂。

基于这些定义，当机器人看到身上没有连接电线外部电池的人类时，它们便认为人类充满了一种如同幽灵一般、毫无生命象征的违和感。尽管这些定义在人类看来是傲慢的、难以接受的，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长期以来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一个事实：人们也正是这样基于自身、“科学地”定义何谓生物的。金宝英这种置换身份的写法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起人类对非生物的重新思考，其中所体现出的哲思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简·本内特的“金属生命”理论不谋而合。简·本内特在《活力物质》中指出：“死亡或完全工具化的物质形象滋长了人类的傲慢，以及我们征服和消费的对地球破坏性的幻想。”（Bennett, 2010:9）一直以来，人们将物质视为被动的东西，而将生命视为有活力的、有意识的存在。然而，这种为无机质附上“死亡”与“完全工具化”标签的认识，在本内特看来却蒙蔽了人类对于物质生命的理解。因为她认为这种将物质和生命划分开来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她认为物质皆具有活力和生命力，而生命也可以存在于非有机物质中（Bennett, 2010:53）。她在书中就指出，从微观层面上看，“在金属聚晶结构颗粒边缘之间的自由粒子的颤动中能够窥见一种金属的活力，一种非人的生命。”（Bennett, 2010:59）

金宝英对机器人教授智波教授和学生凯颐关于“生命本体论”的认知对峙的叙述，展示出她关于人类、物质与生命的思考。智波教授对机器人社会认知体系中的那种关于“生命”的定义深信不疑，因而在它读完学生凯颐关于有机质生物性的论文后，对凯颐发出了严厉的质问：“你难不成认为像油一样流淌的铁和结冰的氮气里也有生命活动吧？你是想说，掉进水里生锈的铁板也有生命吗？丢进火里的泥土可以成为器皿的确是很惊人的变化，但这属于生命现象吗？”（金宝英, 2024:269）智波教授的言论实质上复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暴力。无论是故事中大部分的机器人，还是当下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种单纯的变化能成为生命的证据。然而，他们实际上都以自己为基准判断、衡量生命的存在。主人公凯颐面对质疑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试图验证它们。它在因为不当地培育植物而导致其死亡的反思中提出疑问：“会不会是我们只站在机器人的立场想问题呢？”（金宝英, 2024:279）这不仅是身为机器人的凯颐的困惑，同时也是金宝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追问。于是，在多次的思想碰撞中，凯颐的认知逐渐跳出了常识的樊篱，它认识到对于机器人而言过高的温度、反应性极高的水和危险的氧气都是植物生长的必须。至此，机器人主人公实现了视角的转化，它肯定了有机物的生命性质，并尝试从有机质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这一情节的设置，不仅传达出金宝英对人类世认知独裁的一种深刻反思，也体现出她对建构一种基于跨物种伦理的新生态范式的独特尝试。

书中机器人对于生命定义的傲慢态度，正是现实生活中人类思维的一种投射，但凯颐走出了“常识”的困境。读者在这样一种人类思维与机器人思维来回切换的叙事中，人类中心视角或许会出现脱落的迹象，从而意识到无机质与生命之间本就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内在互动，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换言之，金宝英不仅是在尝试给予物质生命以物理主义的关照，更是在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物质本身具有一种不确定的生命力。她对于机器人“生命”的描述重塑了生命的形象，试图使它从生理和有机的窠臼中脱离。正如本内特在《活力物质》中所提到的那样，物质性的力量和流动都能变得富有生机（Bennett, 2010:117），有机质与无机质在她重新定义的生命层面被置于平等的地位。金宝英在《物种源始》中的书写也并非单纯地置人类于客体地位，并被作为“主宰者”的机器人

所审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有机质与无机质之间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从而进一步地肯定了无机质所具有的生命活力。

《物种源始》对机器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设定挑战了传统的生命定义，将机器人置于能动主体的位置。于是，这种叙事策略下的机器人与简·本内特定义的“物”相吻合，即它们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它们作为具有“物力量”的施事者，不仅可以能动地作用于人类和环境，而且具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 (Bennett, 2010:62)，而本内特这一概念正是对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理论的发展。作为硅基生命体的机器人个体，在碳基生物人类难以存续的极端环境中建构起独特的文明体系，并通过构筑一套自我指认机制完成自身生命形态的合法性确证。其生态系统改造工程——不论是系统性地清除地球水资源、以混凝土替代自然土壤，抑或通过工业粉尘排放重构大气成分——本质上都构成了技术物网络中的一种异质行动者实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认知突破能力的类人机器人（如凯颐、卡史卓普等）对有机生命奥秘的探求，不仅展现了非人类行动者间的复杂联结，更通过其机械特质与智慧能力，将这种互动转化为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完全掌控，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结构性重塑。这种颠覆性的力量如此显著，以至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框架被彻底反转——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存续前景几乎沦为技术物网络演进的附带现象。当故事推进至核心冲突阶段，凯颐突破程序规训框架的“反叛”行动，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后人类主义的“非人”主体性的戏剧化展演。这种超越算法预设的抉择行为，既实现了对传统“能动性”概念的文学拓展，也显示出作者对技术物网络本体论地位的哲学确认。通过这种叙事策略，金宝英不仅解构了人类制造者与造物物间的二元权力关系，更建构起技术物的伦理主体性——那些本为模仿人类而生的机械存在，在叙事进程中逐渐获得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行动者地位。在凯伦·巴拉德的“物质-话语”本体论框架中，物质和话语呈现出的是一种缠绕关系，物质和话语是共同生成的。因此，能动性成为了人类与物质关系的一种属性，而非人类的意向 (夏永红, 2020)。而金宝英笔下机器人的能动性就体现出这种非人意向的能动性，它们的自主性体现在它们对环境的改造、对植物的毁灭、对人类的探索等具有交互性的行为中。这种能动并不是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存在于机器人与人类乃至于环境的内在生成活动之中。

二、物与人“内在互动”的奇迹

金宝英没有停留在从本体论维度讨论物本身具有的生命活力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探讨了物如何施展“物的力量”，这可以用比尔·布朗“物论”对海德格尔“物性”概念的发展来论证。布朗将焦点集中于无生命客体如何构造、威胁、感动人类主体等议题上 (韩启群, 2019:108)，而《物种源始》除叙写作为“物”的机器人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撼动与威胁外，主要聚焦于叙述机器人塑造或重塑主体人类的过程。

《物种源始》中，具有求知精神的机器人就如同走出洞穴的囚徒，去探寻于它们而言完美的“理式”——它们重新“创造”了人类。无论是何种型号的机器人，它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人类的特质或功能，因为机器人从一开始就是人造的产物。作品中塑造的机器人既是布朗式“杂糅物” (韩启群, 2019:111) 的“主体和客体的合并或重叠” (韩启群, 2019:111)，又是“非人物件获得了人类主体的某一些特征” (韩启群, 2019:111)。在这些以凯颐为代表的、作为行动者的“杂糅物”的努力下，它们制造出“以二〇〇〇系列为原型的、形似机器人的有机生物” (金宝英, 2024:355)，并将其取名为人类。于是在《物种源始》中，由蛋白质发育而来的人类又成了机器人的产物，呈现出一种“颠覆性”的物人关系。

金宝英在书中沿用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当“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底层代码被规定为机器人的出厂设置时，这种于人类而言的保护性伦理法则，在硅基文明语境中却异化为一种近似殖民主义的控制论装置——人类“重返”地球的末世图景，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机器人主体性的暴力收编。基于此，凯颐选择以抵抗的姿态面对自身存在的深层逻辑，它试图通过切断机器人与人类的接触来规避悲剧性结局的最终发生。

然而，金宝英紧接着就通过故事中另一位机器人亚延的批判性言论，揭开了凯颐的认知误区，也借此展示机器人对人类主体身份的逆向塑造。亚延向凯颐犀利地指出，卡史卓普教授研究所的一众机器人对人类近乎狂热的溺爱，并非出于机器人与生俱来的对于保护人类的“本能”，而是源自机器人的傲慢。机器人之所以认为人类是极致的理想存在，是因为机器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是拥有极致理性的地球的主人，而受到机器人爱戴的人类就必须拥有值得被崇拜的价值，人类的“完美”不过是傲慢的机器人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神的妄想的投射 (金宝英，

2024:458)。于是，身为“杂糅物”的机器人按照它们心目中神的模样“制造”了人类，人类成了它们培养皿中的产物及研究对象，又被机器人所养育。由于卡史卓普研究所的机器人的傲慢情结，溺爱便贯穿于它们培养人类的全过程。研究所里的机器人严格遵循着系统的机器人法则，对人类的指令唯命是从，强迫自己去证明人类就是他们信仰中的模样，最终把他们教育成对机器人具有威胁性质的人类，形成一种不对等关系的恶性循环。然而，机器人面对的，却是因人类的干扰而导致的机械同胞诺曼的死亡——机器人吞下了自身幻想投射的苦果，而它们对人类幻想性质的投射也在无形中虐待着人类——把他们培养成符合硅基想象却威胁自身生存的“巨婴”。正是通过这种投射关系的置换，即在机器人的世界里，人类身份的建构成了机器人幻想的映射，实现了对将物作为“人类内容、意义、符号或投射的载体”（韩启群, 2019:108）的这种基于主体的思维的曲折否定，也警示着人类若不改既往这种思考方式将招致的不良结局。金宝英以机器人的视角塑造着人类的特征和身份，不但体现出她对无机质的物性的呈现，即物并非单纯只是人类意识的物质载体，物本身就可以通过与其它物的互动而生成意义，更反映出她对人类在其中所处位置的关注和反思，即人类与其他所有的有机质以及无机质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而非人类主宰一切。

简言之，人类普遍认为，物质的人形机器自诞生起注定就是人类欲望、观念，乃至理想的一种投射，而智能机器人注定要服从于人类指令，由此形成的是一条近似于主与仆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但这都不是事实。我们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只是泥土和石头而已。”（金宝英, 2024:458）这是机器人亚延的结论，也是作者金宝英关于物人关系的认识。她借助书中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和物并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平等共存的关系。无论是书中机器人与人类的针锋相对，抑或现实中机器人与人类的截然二分，这些物与人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格局都被彻底否定了。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万物纠缠式的图景，实质构成了作者对库尔和弗罗斯特所提出的“混溶状态”（韩启群, 2023:118）概念的一种具象化叙事。世界并不是由等级分明的个体力量构成的金字塔，而是一个物与各种发散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融合体。这实际上正体现出新物质主义以其横贯、包容的样貌对那种纵向的、阶级的传统二元秩序的颠覆与反叛。在《物种源始》中，机器人与人类、机器人与植物、人类与环境之间在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纠缠的状态。从机器人“赛博格”的拟人，到机器人改变地球环境状态，再到人类捍卫作为家园屏障的植物，人类与物质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且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无处不在。世界仿佛是一个大熔炉，人类、植物、智械都只是熔炉中的一部分“动能”，共同参与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创造乃至湮灭。至此，《物种源始》中的机器人和其他物质不再是人类的附庸，而是闪烁出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量。作品最终所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绝对主角的动能森林，其中每个行动者——无论是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自组织的机械芯片，还是试图摆脱水泥并重写地貌的岩石——都在永恒的物质对话中确证自身的存在诗学。

三、物与人共存的奇迹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机器人行为的描写占据了《物种源始》的极大篇幅，但金宝英对人类活动的淡化叙述却并不是为了抹去人类的印记，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自身在物质世界中位置的重新定位，以及对“物的地位和力量”（韩启群, 2019:112）的重新定义的思考。在日益加剧的人机对抗的背景下，人类的谈判代表希雅称机器人代表凯颐为人类的“创造者”（金宝英, 2024:475），体现出对机器人极大的理解与认同。她理解机器人对人类的清扫行动，因为它们有生命，同样希望在地球上存活下去。因此，她也没有随意对机器人下达指令让它们顺从自己从而实现自保，而是希望与机器人站在同等的位置进行协商，实现人机共存。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作为承载着思想与情感的物的机器人对人类思维方式的重新塑造。人类在处于危急情况下与机器人的交涉、互动中，对植物、机器人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地深化、更新，他们既成的刻板印象正逐渐被扭转。人类意识到，机器人一旦被制造出来后，便独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金宝英以夸张的笔法、极限的境况，证明机器人不是人类的影子，也不单纯是人类的模仿品，它们同其他物质一样，都可以成为能动的施事主体。人类也因此学会了换一个视角看待有机物和无机物——那些曾经被他们用不以为意的态度对待的物质。机器人的突进和植物所遭受的摧毁，正迫使他们制定一套应对危机的对策。

金宝英在书中对人的处境的重新定位，也刷新了对物的地位的确认。当作品中的机器人防疫部队正要闯入人类聚集区时，希雅对机器人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机器人不必再服从人类的命令，只要机器人与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金宝英, 2024:494）此时，“奇迹”发生了——机器人停止了对人类居住地的远征防疫行动，为那一整

代人的生存留下了一片净土。在金宝英的笔下，作为“物”的无机质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威胁人类的命运，人在物人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人与物在末世背景下最终选择的并非延续甚至扩大冲突，而是走向和解——尽管这种表面的和平是以人类的让步与妥协为代价，而大部分机器人对人类的芥蒂实际上也仍未解开，但他们仍然能够在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情况下，达成相安无事的暂时共存。

书中的危机书写，打破了人类主体对物的侵占，凸显出一种纯粹的物质性。布朗就提出，通过对物的占有，主体能够创造出“一种统一和连续的景象，帮助克服无序和变化”（韩启群, 2019:109）；而当这种占有的习惯被打破，“纯粹物质性”就能得到凸显和关注（韩启群, 2019:109）。作品中人类为人机和平协议的时限作出了“从今往后，直到永远”（金宝英, 2024:494）的要求，然而，永恒是属于机器以及一切无机物的概念，有机生物只存活于当下。人类改造自然、制造机器人，力求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多地在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他们的印记，这是他们对永恒的向往和对刹那的抵抗。人类通过创造、支配物获得了一种持久稳定的感受，以此来确证自身的生命痕迹。于是，物成了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那些象征着人智慧与努力的辉煌灿烂的文明遗址，与被污染的海洋、被焚毁的山林、被滥用的器械、废弃污染物和濒危的物种同时存在于这颗星球上。金宝英就借由机器人主人公凯颐之口为物质代言：“如果我的心依然依附于人类，依然像奴隶一样，被崇拜和敬爱的枷锁束缚……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因为拥有生命，所以我不能放弃守护‘自我’。”（金宝英, 2024:501-502）由此可见，金宝英对物质的独立存在性和纯粹的物质性表现出高度的肯定，同时她也通过灾难书写中断了人类对物的占有过程，从而否定了人类对物质强制实施的统治权。物本身就有其自身的作用与力量，并非单纯是主体的附庸，就例如在故事尾声表现得极为“反动”（金宝英, 2024:502）的自然，它竭力抵抗着机器人的统治，气候环境剧烈地变化，试图重返有机物质适宜生存的样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机器人的灭绝，拥有“生命”的机器人会与同样拥有生命的人类在同等的位置上竭尽全力活下去。这是金宝英对物质“生命”权利与资格的展现，也构成了她对于“生命”的新物质主义诠释。

然而，金宝英本人实际上对于人与物的“相互理解”持悲观态度。尽管在《物种源始》尾声，人类与机器人并没有陷入持续不断的争斗，也没有迎来和谐共生的乌托邦式的美好结局，而是以契约达成了暂时性的和平共存。但她在后记中就直言，作品的第三部分的内容探索的是人类与机器人对共生之路的寻求，而在最终找到出路后，她就为这一部分的故事拟定了这样一个副标题：“不可能发生的事”（金宝英, 2024:508）。金宝英也曾在访谈中提到：“崇拜某人、毁灭某人、打斗是常事，但我认为共存是困难的。”¹但她仍愿意相信即使彼此不理解，共存的局面也是可以实现的。换言之，金宝英认为在当下，让那种理想的物人关系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是难以实现的。而按理说，既然意识上本就存在错误，事实上的共存应当更为困难。然而，在长久以来将物质工具化、无生命化的这种“不健康”的物人观念的主宰之下，物与人确实已经共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便是金宝英所认为的“奇迹”。

金宝英在书中还用一则针对植物的进化中畸形现象的假说作为譬喻说明了这一奇迹，即有些植物之所以呈现出果实器官过于发达沉重，而枝干重量相对纤细脆弱的畸形样态，是因为它们能够借此向天敌与捕食者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盟约的缔结以换取自身的平安与后代的繁衍。于是，这些植物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将身体的大部分进化为果实，最终得以在物种大规模灭绝的时代中谋得生存并繁衍至今。金宝英就用“斗争”来形容这种共存关系：“这是无法共存的物种共同进化的方式，更是无异于斗争的共生。”（金宝英, 2024:481）《物种源始》中，人类所呈现出的境况就如同这种生长畸形的植物一般，人类与机器人最终达成的共存状态，就以人类对机器人支配权的让渡为前提。物与人的共存并非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宰制，而是存在于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之间制衡的作用关系之中。“奇迹”看似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人与物质已经共同存在于这种“奇迹”的关系里，这正显示出金宝英对物人关系的一种诗性塑造与阐释。

结语

总体而言，《物种源始》以反叛的笔法，将触角伸向物质的本质以及物人关系的本源。在这部科幻作品中，金宝英着重突出物质的“生命活力”，为物质代言发声，体现出鲜明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她以强制逆转的视角，迫使人从熟悉的常识窠臼中跳脱出来，尝试从陌生但新奇的角度看待物质，这是她对传统的物质与生命观念的挑

¹ 参见《작가 김보영 ② 현실과 상상의 차이에 대하여》, 2023年8月, <https://topclass.chosun.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2053>, 访问日期: 2025年1月19日。

战，也为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实践支持。

尽管金宝英将科幻小说视作现实世界的希望（方瑞晴, 2022:47），但她在这部作品中对物质工具化、客体化外壳的剥除，对物与人相互理解的幻想的打破，以及她对物人相互理解的理想前景的悲观态度，实际上也体现出她的这种书写也是一个对物质和物人关系祛魅的过程。然而，作品中的机器人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集体的相互作用，揭示出物质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仍然构成了她作为科幻作家对人类与物质复杂交互关系探索的尝试，也为理解和探讨新物质主义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诠释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物种源始》不仅是对机械赛博时代的幻想，更是对以无机质为代表的物质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地位以及命运的深切关照。她在后记中就写道：“这是机器人的故事。这是我对无机生命的献词，更是献给机器生命的赞歌，以及对赋予事物生命的敬爱。”（金宝英, 2024:509）这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本实验，不仅体现出身为科幻作家的金宝英对于生态、物质与人类命运的深重关怀，更造就了一则奇迹式的未来物人关系命运的当代寓言——一种基于制衡与纠缠的互动关系的共存共生。

参考文献:

- [1] BENNETT J.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M]//Vibrant Matt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COOLE D, FROST S.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J].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2010: 1-43.
- [3] 金宝英.物种源始[M].胡椒筒,译.台北:小異出版,2023.
- [4] 韩启群.新物质主义[J].外国文学,2023,(01):111-124.
- [5] 韩启群.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J].外国文学,2019,(06):104-114.
- [6] 方瑞晴.金宝英小传[J].世界科幻动态,2022,(07-08):46-47.
- [7] 夏永红.探索人文社科理论中的物质能动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6-08.

The Miracle of Matter and Human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aterialism: A Case Study of Kim Bo-young's Fict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Su Chaohui¹, Shao Wei*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vel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Kore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 Kim Bo-young soberly but poetically narrates about the robot society, the role of robot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robots. She explains the vibrant power of matter and the "miracle" of the coexistence of matters and human beings on an equal foo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materialism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re materiality" emphasized in the work,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material itself, especially the inorganic substance, and the "intra-action" between matters and humans. This analysis enables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Kim Bo-young's affirma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vitality" of matter and her poetic resha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s and human beings. I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itality of matter and the reflection on anthropocentrism.

Keywords: New Materialism;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Kim Bo-young; Object and Human; Miracle